

国资国企改革进行时 混合所有制成“标配”

■ 本组稿件采写 何宗渝 杨玉华 姚玉洁 何欣荣

策
划
词

自上海于2013年底在全国率先出台“国资20条”,打响地方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后,日前广东省又出台《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至此,已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甘肃、山东、江苏、云南、湖南、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广东16个省份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发展混合所有制对推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激发国企发展动力和市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企业所处阶段决定对改革的短期目标和路径不尽相同,如果“一刀切”盲目去混合,恐将违背企业发展规律,并引发国资流失风险。

过半省份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广东省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至此,已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甘肃、山东、江苏、云南、湖南、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广东16个省份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发展混合所有制成为所有改革方案的“标配”。

此外,安徽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的《2014年深化全省国资国企改革的工作意见》,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也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意见》,也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出安排。

在已出台改革方案的16个省份中,有一半的省份明确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时间表

目标。如重庆提出通过促进股权多元化,推动国有资本与其他社会资本融合发展,改制上市,改组或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以及加大重大项目投资开放力度五种方式,在3-5年内将三分之二的国企发展成混合所有制。

广东提出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江西提出5年左右使70%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甘肃提出到2020年混合所有制比重达到60%左右。上海则提出,除了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的,其余企业在3-5年内实现股权多元化。

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监管,重庆率先

明确,国有股权比例低于50%的企业不再简单套用国有及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监管制度。此后,江苏、北京等地也在改革方案中作出类似安排。

在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方面,超过一半的省份提出了数量目标:重庆计划用3-5年左右推进20家重点国企整体上市,80%以上的竞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湖北提出到2020年力争将全省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提高到50%;湖南提出到2020年竞争类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率达到80%左右;广东则提出到2020年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由现在的20%上升到60%。



已经出售给平安集团的上海家化在激励机制方面走在前面,较早推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覆盖中高层管理人员和营销、技术骨干等,激励对象自筹资金购买股票。上海家化利润快速增长,以国企身份在竞争激烈的日化行业占据重要地位。

国企改革不能指望“一混就灵”

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开启,混合所有制成为不少地方推动改革的抓手和突破点。但在改革中不顾企业发展阶段和现实情况,定指标、下任务,“为混而混”“一阵风”式的改革倾向引人担忧。

发展混合所有制对推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激发国企发展动力和市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必须看到,与上一轮脱困式的国企改革不同,当前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条件差异较大。一部分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尚未完成,暂不具备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基本条件,或仍背负较重的历史包袱,在为转型升级、扭亏增效而抗争;也有不少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资产优良经营前景看好,更注重未来战略布局。不同企业所处阶段决定对改革的短期目标和路径不尽相同,如果“一刀切”盲目去混合,恐将违背企业发展规律,并引发国资流失风险。

同时,也必须看到,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搞好国企的办法之一,但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不可能也不能指望“一混就灵”,混合失败的案例并非少数。大量具有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的改革经验表明,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既要有合理的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也要有完善的公司治理,还要有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人才、技术等优势。同时,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还要从企业内部改革、完善监管体制等多个方面统筹推进。

当前,国企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改革涉及面广、内容庞杂、难度非常大,迫切需要各地各部门脚踏实地想办法、出真招,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推动改革,切忌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

上海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出了什么?

上海于2013年底在全国率先出台“国资20条”,打响地方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上海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出了哪些“真经”?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变化一:市场是最好的定价员

在上海一系列国资“大腾挪”中,资本市场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3年4月,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向弘毅投资转让上市公司城投控股10%股份,转让价格为公告前30天平均股价加上一定溢价。

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间资本,关键是要找到公允的市场价

格,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无疑最有说服力。“事实证明,没有市场化运作,寻租等道德风险就难以避免,单靠审计监督解决不了问题。”

变化二:去行政化不再是口号

国有企业一个饱受诟病的问题是行政化、官僚化,“唯上,看领导脸色而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

上海东浩兰生集团旗下的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合伙人”试验,集团出资51%,62名业务和经营骨干通过成立有限合伙企业出资持股49%。

“从员工变成股东,大家责任心不一样

了。”五矿公司董事长钮为民说,“过去决策一把手拍板,下面人不操心,现在可不干了,因为决策错误损失的是自己的钱。比如财务报销,过去只要不违反财务制度一般就报了,现在要求管理层差旅费账目公开,接受监督。”

变化三:激励机制到位杜绝“挖社会主义墙角”

在一位资深国企掌门人看来,此前国企的“59岁现象”、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员工特别是管理层与企业没有实现利益绑定。“有些员工待遇低就拿回扣,拿人家一百元,损失企业一万元,国企就这样搞坏了。”

发展混合所有制会否造成国资流失?

8月21日,广州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等人涉嫌贪污、受贿案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其涉嫌贪污受贿约4亿元;稍早前,广西国发林业造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安明明等人涉嫌利用改制、转让和拆迁,非法侵占国有资产和拆迁补偿款近7000万元,被提起公诉……

频频曝光的国资流失大案让人担忧:发展混合所有制会否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警惕借混合谋私利 造成国资流失

发展混合所有制是规范国企治理结构、增强国企发展动力、激发国企发展活力的重要举措。但从操作层面看,必须高度重视可能由此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关键在于要做到程序规范和合理定价。

发展混合所有制将涉及大量资产的重新组合,需要重新评估定价。对于不能进入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进行交易的国有资产,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只通过谈判协商,就很难形成竞价,也难以判断价格是否合理。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表示,资产评估通常是对单项资产进行估

价,难以体现国有资产的整体价值。“对国有企业的品牌、技术、渠道、市场地位等无形资产,还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在社会诚信度整体较低、中介机构不规范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容易被低估,造成隐性的国有资产流失。”

他还提出,更大的流失风险在于垄断行业的盲目放开。“在没有打破垄断之前,谁进去都能挣大钱,还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权力寻租。”

国务院国资委一位官员表示,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程序合规是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虽然不能保证遵守程序就一定不会有问题,但不遵守程序就一定有问题!”

谨防员工持股 “金手铐”变“金元宝”

在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中,一些国企对开展员工持股热情澎湃。国务院国资委明确表态支持央企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上海、广东等地的改革方案也明确“支持企业经营管理者、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持股”。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说,持股是

任,又能让员工个人价值得以彰显,但不能是给员工的福利。“与全员持股相比,采取管理层和技术、业务骨干持股有利于稳固公司核心团队,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彭建国说,以前不少企业搞过员工持股,后来被叫停了,主要是因为国有资产流失和内部分配不公。他认为,如果简单地像过去那样搞管理层收购,一夜之间将造就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要谨防戴“金手铐”变成送“金元宝”。

“从前些年的地方国企职工持股案例来看,教训多于经验。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不是企业内部职工的,如何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贸然推动。”彭建国说。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说,企业有国有股、民营或外资股,加上内部管理骨干持股构成“三足鼎立”的股权结构,相互制衡,可以把各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调动起来。

但是,不少专家和企业负责人都认为,究竟采取哪种方式持股、持多少股,必须一企一策深入研究,不能一哄而起;应在人力资本突出的科研类企业、竞争性强的企业,集团公司所属的二三级企业先行先试,而在资源型、政策性、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应慎重。

拖延改革 恐将造成“体制性流失”

尽管改革可能引发这样或那样的国资流失,但专家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不应“因噎废食”,拖延改革恐将造成更大的流失。

周放生认为,与交易过程中的流失相比,“体制性流失”更需要关注。“国企高管腐败100万元,平均要输送1亿元的交易额,背后存在的安全、环保、质量问题,将给社会、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此外,不负责任的盲目投资,项目投产之日即是亏损之时;管理不善造成的跑冒滴漏,任凭国有资产“风吹雨淋”;没有效益增长的目标考核,坐视国有资产坐吃山空,都会造成严重的体制性流失。

与上一轮改革相比,国企改制的法律法规已较为健全,产权市场的渠道已较为畅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强化了公众监督。尤其是中央反腐的高压态势,也让那些企图假改革以自肥者望而却步。只要坚持程序规范、透明,市场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主动接受社会和职工监督,大规模、大范围的国资流失可以避免。

激谈互联网 纵论“新常态”

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认为:无条件向移动互联网投降。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经济规模会是美国三到四倍。移动互联网是PC的十几倍。移动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嫁接后是新行业新产品,其规模会数倍于传统行业。大健康产业规模未来会超过房地产,成为GDP增长的第一贡献。另外就是环保行业值得期待。

经济“新常态”,企业大佬怎么看?

在这次论坛上,经济“新常态”,成了企业家们讨论的热词,频频出现在众多与会企业家的发言中。

在这个汇聚当代中国顶尖企业家群体的论坛上,“新常态”为何受到热切关注,企业家对这一新提法又有哪些真知灼见?

今年5月,“新常态”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中。当时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和在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的重要表述,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8月23日的开幕主题论坛上,万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来了一段戏说,引得现场掌声连连。

冯仑说,从企业经营环境来看,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常态和“新常态”。第一件事,看谁挣钱。常态下,比如说很牛的人挣钱,咱们挣不着钱。“新常态”就是大家都有机会挣钱,不要埋怨找借口,自己要努力工作挣钱。第二件事,过去常态下的权钱勾结的人能挣钱,但是老老实实的人挣钱就比较辛苦。第三是常态下搞关系的人会挣钱,“新常态”下会做产品

的人挣钱;常态下知道暗箱操作的人能挣钱,“新常态”下借助网络陌生人之间可以做生意。

冯仑说,这两三年来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从经济到政府到社会道德,我觉得这些变化都是“新常态”。而这些变化合起来,就是建设一个以企业和市场为基础的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推动经济能够持续地发展和有效地转型。

高盛亚洲投资管理事业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认为,所谓“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旧常态是表现以下经济特征:第一是增速很快,过去30年平均经济增长10%左右。第二是失衡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第三个特征主要是靠银行贷款,而不是主要靠股权融资来进行,所以我们看到经济杠杆率在不断提高。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进一步阐释:其实旧常态说穿了就是粗放型、数量型扩

张的一种状态,它是靠低成本来驱动的。“新常态”就是要转到一个集约型、质量型来进行发展。

邱晓华估计大概还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才能够基本迈入“新常态”的初期轨道上。也就是说,到2016年中国经济才能进入到真正的“新常态”。

素有“任大炮”之称的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一向嘴上不饶人,在开幕主题论坛后,他走上前台一一反驳刚才发言嘉宾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任志强说,是不是“新常态”看两条:投资拉动变了吗?经济底的做法变了吗?任志强认为,政府要保底经济,往往就要投资拉动。中国不太可能马上进入“新常态”,只能在慢慢转化中进入新常态。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认为,进入“新常态”是个缓慢的过程,因为

目前适应低速增长的社保体系并未建立。也许几年以后,社会保障体系可能就更健全了,整个社会就会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常态。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在论坛闭幕时露面并演讲,他说,今年是万科30周年,正准备做未来十年规划。十年前的规划就是数量级增长,和国家一样的。不要说我们国家总是说GDP,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就是你的营业额,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国家在转型,企业也要转型,我们在转型当中,下一个十年怎么办?我们一直在讨论。

8月24日下午,在论坛闭幕总结发言中,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道出了企业家们的内心想法:中国正在向一个发达经济体国家转型,大家很担心这个转型是不是跟得上。所以这个“新常态”我们一直在关注在研究”。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上接 P1]